

专题

← (上接3版)

个哲学文本的翻译和阐释,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从语文学或语言学的角度来实现的。

在语法的解释方面,甲柏连孜也予以了说明:

在语法的表述方面,我也没用很多的篇幅。我认为,汉语词汇的分类并不能以我们的话语分类范畴为基础。一个汉语的词,其基本含义是“大的(gross, 形容词或副词),大人物(Grösse, 名词)”,这对我来讲永远都是形容词,不过眼下根据不同情况,也可能是形容词、名词、中性动词或及物动词等等。因此,所有德文表述方式都是依据其基本的含义,亦即通过拉丁语的功用来表达的。

也就是说,甲柏连孜认为,很难将汉语词汇的意义和语法属性同时“翻译”成德语。

不论是《太极图说》还是朱熹的解释,都是用古代汉语写成的。有关古代汉语词形和词类的问题,甲柏连孜很早就注意到了。因此,没有基本的古代汉语语法和词汇分析,就直接进入中国哲学的世界,甲柏连孜认为是不可能的。

有关古代汉语,甲柏连孜认为,“人们尽可能像学习其他语言一样,纯粹通过实践和实证的方式学会它,但是如若没有敏锐的哲学思考,那就不可能从学术的方面去研究它、理解它”。有关整个的中国的精神财富与古代汉语之间的关联性,甲柏连孜认为:

这一语言原本的形态就已经足够说明一切了,它证明了自己作为重要文献承载者的地位,能表达任何逻辑上的抽象化,它有着丰富的时代结构特征,同时又短小精悍,并富有雄辩力和真挚情感,这些优点如此统一于汉语之中,这在其他语言中是前所未有的。汉语语法对学习者的记忆要求并不高,但是却对其逻辑思维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通过背诵句型和逐一列举不规则用法,汉语学习者可以减轻负担。对此汉语学习者需要将自己的思想与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相适应;他不仅需要彻头彻尾理解这种思维方式,还需完完全全去体会它……

我想,这也是古代汉语特别吸引甲柏连孜的地方吧。

选择使用《满汉合璧性理》的原因

甲柏连孜之所以选择了

《满汉合璧性理》,而没有使用《朱子语类》的版本,或者明代的《周濂溪集》或清代的《周子全书》以及《太极图集解》,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甲柏连孜认为满文可以加深他对中文原文的理解。就此他写道:

我附上了满文的译文,其原因并非是因此可以增加可供参考的文本文献,而是想要引起对批评的关注。无视这些当地阐释者的阐释是理应受到惩罚的,我们要有自己的看法,必须在这些本地学者的观点面前进行辩解。因此我常常记在心头的是,我知道在哪些地方我的观点是与满文学者的观点正相反的。在我的注释中,只是在涉及实质性内容方面,我才想到这些偏差。我们的理解与满文学者在形式方面不同的众多事例,读者自有分明。

在甲柏连孜看来,满文的翻译和解释对他理解这个中文的哲学文本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只有汉语的解释,理解的视角常常比较单一。满文译文给甲柏连孜提供了亚洲另外一种语言文化对周敦颐 and 朱熹的不同理解。尽管甲柏连孜常常不同意满文的翻译和解释,但这无疑为他的翻译和阐释提供了另外一条路径。

甲柏连孜后来在“东亚研究与语言学”中更清楚地阐述了他的这一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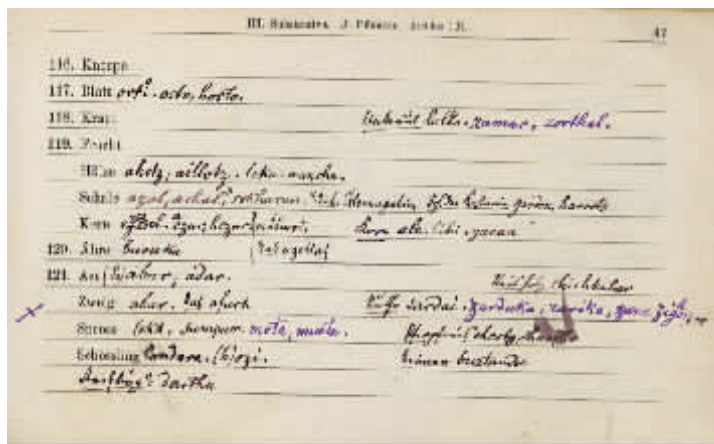
对于满族在中国的异族统治,我们汉学应当在很多方面都予以感谢。最重要的当然是满文文献。满文文献数量并非卷帙浩繁,并且只算是其原本精神财富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将诸多重要的中文文献用方便的字母文字翻译成了易于学习的语言,这些译文并且被认为几乎是可靠的,现存的这些文献,即便是今天对我们的帮助都是不可估量的。任何欧洲的汉学家都不可忽视满文。

满文是中国当时皇室的语言,也是打开中国皇家宫殿大门的重要手段,当时柏林的王室图书馆从17世纪以来除了收罗中文图书外,也采购一部分满文图书。正如甲柏连孜所认为的那样,对于大部分当时欧洲的语言学家来讲,作为拼音文字的满文更容易掌握。满文文献为语言学家和汉学家掌握中文,进而研读中国文献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因此,当时王室图书馆所收藏的满文文献,也大都为满汉合璧的。柏林王室图书馆便藏有诸如康熙十五年(1676)刻板的《满汉合璧朱子节要》(五卷),系朱子语录及满文译文的双语对照版。

不论是汉语还是满文,对于甲柏连孜来讲都是外语,他



甲柏连孜《语言学》(1891)扉页



甲柏连孜的语言索引卡片

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掌握如此众多的语言,在于他这样的认识:“任何对于陌生精神世界的语言习得都同时是一种打破诸多偏见的行为,而这些偏见正是我们之前习得的习语中附着而来的。”掌握一种从结构和形式上来讲完全相异的新语言,对甲柏连孜来讲,是“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erschließt sich in uns eine neue Gedankenwelt),可以反过来更好地理解自己。

内容处理的方式

博士论文最重要的“正文”又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导论”,主要是综合朱熹的《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周子太极通书后序》以及其他相关文字而成。甲柏连孜将此分为20个部分进行满文的拉丁字母转写、德文翻译工作,并且做了详尽的注释。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哲学阐释之外,对于语言学家甲柏连孜来讲,更重要的是他对很多概念从语文学角度做了词源学方面的解释。其后是周敦颐绘制的“太极图”及其德文翻译。其二是接下来分为10节的对《太极图说》的翻译和介绍,这包括:1、太极,2、阴阳,3、五行,4、太极一也,5、乾坤、万物,6、人,7、圣人,8、君子、小人,9、三才之道,10、易经。除了周子的原文外,也包括朱熹的注。

在朱熹的“导论”中,中文原文下面分为左右两栏:左栏为满文译文,右栏为德文翻译,其下是甲柏连孜的注释和阐释。以第2节为例,中文原文为:“而孔子于斯文之兴丧,亦未尝不推之于天。”满文是《满汉合璧性理》中相应的甲柏连孜转写成拉丁字母的部分:Kungze ere sú-i yendehe gukuhe be, inu abka ci fisembuhékóngge akô. 之后是德文翻译: Und Khung-tsi,

anlangend das Erstehen und Vergehen dieser Lehre: Alles schreibt auch er dem Himmel zu。

在下面的解释中,甲柏连孜认为,朱熹的这句话显然在暗示孔子在《论语·子罕》中的一句话:“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IX, V, 3)他解释说,当时孔子危在旦夕,上天委托他以文王的学说为使命,不要灭绝这一文化。因此,在文中使用了引人注意的“斯文”一词。

甲柏连孜认为,古汉语仅有两种所谓的语法要素:固定而清晰的词序规则和说明性的助词(虚词)。因此,除了一些中国文化史方面的解释之外,甲柏连孜更多地是对他认为重要的“虚词”进行了解释。首先,这句话一开始便用了“而”字,他认为这是一个“后置从句”,所以之前使用了一个虚词“而”字。之后他解释在这句话中两次使用了“于”:他认为,第二个“于”只是用来体现第三个宾语的,相当于“推”的宾语。他的依据是词典,其中的解释为“to lay on another's charge”。接下来,“亦”解释为“也”,是与古代的事件相适应的。“未……不”是一个双重否定词,用来加强说话的语气,从而得出肯定的结论。“尝”本来是用作表示完成式的助词,这里常常仅用在表示否定的词后以加强语气。此外,他还解释了句子中两个“之”的用法。甲柏连孜认为,第一个“之”之前的“斯文”是第二格,表明后面的两个动词是动名词;后一个“之”代表之前的“兴丧”。

满文的译文,在很多方面为甲柏连孜理解古代汉语的文本提供了帮助。同样在朱熹的“导论”之中,其中第12节的一句“潘清逸志先生之墓,叙所著书,特以作太极图称首”,由于潘清逸本来就不是特别著名的学者,这整句话的逻辑关系,甲柏连孜是通过满文的翻译弄

清楚的。实际上,潘清逸(潘兴嗣,约1023—1100)在为好友周敦颐所作的“墓志铭”中将《太极图》居首,对朱熹影响很大。朱熹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个肯定《太极图》的意义并以《太极图解》和《太极图说解》(1170)对太极图作出系统诠释的哲学家。

当时学者对《太极图说》的评价

1876年3月,甲柏连孜在莱比锡大学提交了他有关《太极图说》的博士论文。尽管这篇博士论文的传播范围有限,但当时读到这篇论文的学者还是对其予以了很高的评价。论文的评阅人之一、之前担任莱比锡大学校长的布罗克豪斯写道:

请不要让我对您论文的内容做任何评价,因为“阴”和“阳”是我一直以来讨厌的概念,并且朱熹也没能让我赞同此类的观点。但是,您运用语法-句法的处理方式,我认为是非常成功的,也是适当的:您对中文文本的可靠的解释,都是建立在有关汉语中虚词准确的知识基础之上的。

因此,尽管布罗克豪斯对理学中太极之类的概念并无好感,但甲柏连孜使用语法分析的方式来解释哲学文本,给布罗克豪斯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之后,甲柏连孜在给他最喜爱的妹妹克莱门蒂妮(Clementine v. d. Gabelentz, 1849—1913)的信中写道:

硕特,我向他明确表示,我最好从他那里得到责难而不是褒扬。他希望毫无顾忌地提出尖锐的批评,昨天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您的论文所涉及的太极图,或者您对太极图的解释,我在认真阅读了之后,可

(下转5版) ➔